

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

言思录

第六期2016年12月20日

- 吴刚：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迷人气质
- 郁喆隽：沙龙拾萃电影中的哲学
- 《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主题书评
- 访谈实录：张炜炜老师
- 咨询长廊
- 《言思录》（第七期）征稿启事



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部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博士沙龙工作坊

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

起源于一个想法

开始于一种信念

发展于一种坚持

致力于一种精神

给学术以尊严

嘉宾寄语

音乐抚慰心灵

——顾悦（第 222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愿上外博士沙龙给上外学子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智慧和美！

——吴刚（第 226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日新月异

——陆扬（第 221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愿博士沙龙的头脑风暴更加猛烈！

——刘宏松（第 219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祝参加沙龙的各位精英，以崭新思维，出精品文章！

——许文胜（第 229 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顾问：赵蓉晖，杨雪莲

本期特约顾问：叶隼

指导：张绍铎，田昊罡，夏卡莉，丁娟，张艳，盛攀峰，王卫萍，李秀秀，刘旭婷

策划：余桂茗

主编：张家铭，余桂茗，陆冰莹

采编：杜宜阳，蔡思彧，俞淼，王芮，刘嘉靓，朱文山，殷文文，谢天宇，李歌，孙敏，丁晓婧，李梦绮，贺宇倩，何传久

美编：张朦，吴林璞，宋紫桦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迷人气质

主讲人介绍：

吴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副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有《霍比特人》、《莎乐美》、《邪恶的肉身》、《勇敢的船长》、《美与孽》等译著。

一、文学的主观性

我觉得如果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一个限定词，就加上“读书人”吧。“读书人吴刚”——这个称号我觉得自己还是担当得起。英语学院有位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说过一句伟大的名言：“我这个人



学问不好，但别人学问好不好我还是能看出来的”。当然他这话的前半句是在谦虚，可放在我身上就正合适。但是我也想说一说这句话：“我这个人学问不好，但别人有没有学问，我多少还是能看得出来。”通过这些年看过的书，自己虽然写不出像样的文学，却知道好的文学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我心目中好的文学，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东西用一句话就能总结：我认为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是文学的一段黄金时期，这段时期既是属于英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且从我非常有限的读

书经验来看，我认为这段时期在英国涌现出来的人和他们的创作的文学，到目前为止是我看到的最好

的文学。当然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我希望将来，它将成为最好的文学时代之一。

我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了——你为什么这么武断，为什么十九世纪是最好的时期？文学和理科还是不一样的。理科的真理是唯一的，但文学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喜欢林黛玉，有的人喜欢薛宝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种文科的东西是很主观的，没有必要强求大家统一。

今天讲座主题的背景不是特别重要，我们根据英国十九世纪发生的大事件作为经纬，一点一点看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小时候经常跑到马路上闲逛，在这当中得到很多乐趣，但是最后要买一只铅笔回家。为什么要买铅笔呢？就是怕家里人担心自己。大人比较功利，比较实际，他们很难想象这么几岁的小姑娘居然会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之中，在闲逛中居然能够得到无穷的乐趣。但这恰恰是她作为作家所具有的非凡的品质。大家知道罗伯特·弗罗斯特写的《雪夜林边驻足》，小马也不懂叙事者的心思。它想：这里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停下来呢？对于比较功利的人来说，我们要给他们一点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文学是非常主观的、想象的东西，我们各取所需。

二、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平和气质

我们讲的十九世纪是从 1800 年开始，但实际上一个时代不可能正好从 1800 年开始。我们把时间线往前延长到 1770 年，是为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他就是在 1770 年诞生的。威廉·华兹华斯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与时代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他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在他身上这种革命的热情慢慢地冷却下来，最后受到艺术的锻造，在艺术的追求当中得到救赎。这个其实反应了英国整个的时代，我们在他

身上能多少找到一些英国十九世纪文学为何如此迷人的原因。

我觉得英国文学里面没有那股戾气。举个例子，中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出过一本书，叫《留学美国》。作者说他在小学的时候为了反帝学英语，初中的时候为了反苏学俄语，高中的时候又改学英语。他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学过两句英语，之后一直没有用：Chairman Mao is our red commander. We are his little red guards（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在 89 年出国，到了密歇根发现很多美国女学生又唱又喝，赶着去开派对。他想到自己三个月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对比非常强烈。人家在吃吃喝喝享受生活，中国学生却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想说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迷人气质就在这，它们没有这种你死我活的戾气。

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是动不动就是采取极端的方法。我们的思维适应了革命，所产生的革命思维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判断。我们过去批判英国文学的时候觉得它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们看狄更斯的文学的时候，觉得它不过瘾，因为作品中没有描写工

人阶级的起义，工人阶级没有跑到资本家的家中把他们杀了。我们认为只有这个暴力革命才能解决矛盾，但其实在暴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矛盾。至少我们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应该只关注社会当中的矛盾是否剧烈。英国的确没有发生流血革命，社会有矛盾，但大家都在心平气和地找解决方法。很多英国作家的作品都描写到社会问题，但没有写到振臂一呼，喊打喊杀，更多的是善意的调侃。我觉得士可骂，不可杀——大家可以为了意见不同互相争论，这些不要紧，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无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佬依次登场：1772 年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诞生。他与华兹华斯的搭配非常好。柯勒律治在理论方面也非常厉害，逻辑非常清楚，不容别人反驳。1774 年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诞生。骚塞将来也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以前英国的桂冠诗人要等到前任去世，后人才能接班。后来这种政策就变了，可以同时存在多位桂冠诗人。

当然话说回来，因为十九世纪正好又是一个诗歌逐渐式微的时代，散文和小说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我们将来会看到其他重要人物。1775 年，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和简·奥斯汀两个大腕儿诞生，都是开辟一片新天地的人物。查尔斯·兰姆对于十九世

纪英国文学做出的贡献尤其大；简·奥斯汀（Jane Austen）更不用说了，很多英国作家也很喜欢她。比如毛姆就非常推崇她。他说，“我到全世界各地去游历才能写出这么一些东西，简·奥斯汀足不出户，就生活在一块弹丸之地，整天就是家长里短，就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我很佩服她。”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真正厉害的文学功底就是要能从小处着手。事件越平常、越平淡，生活越平静，写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伟大的。我们不能指望动不动就会发生一战、二战这样的事件，尤其不能因为自己写不出作品而渴望再来一次世界大战。这种人尤其可怕。这个时候，大家再想想简·奥斯汀，就是几个闺蜜坐在一起八卦八卦，就能写出作品，这个才算真正的厉害，才叫真正的文学。

文学不能光靠事实的题材——事情很伟大，你写出的作品也伟大，这有什么稀奇。事情不伟大，你能把它写得很伟大，这才叫真正的厉害。你说，那些姑娘整天愁着相亲的事情，是不是文学性的？你能说里面包含的思想不是惊心动魄、历久弥新的吗？到了二十世纪，再来看看这些思想，会发现它们先进得惊人。其中一些女子的见识，也能跟我们现代的人——对话。我们现代的人“要找白富美，要找高富帅”，这种思想意识放在十九世纪的简·奥斯汀面前，实在是太丢人了。人家那个社会就知道要追男女平等，

● 沙龙拾萃

要独立，而且她的生存环境那么恶劣，还能够想着美好的事情。当时社会女孩子找的对象如果不是有继承权的长子，她还是会坚守自己的爱情，捍卫自己的爱情。1776年，文学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但是在美国那边，1776年是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独立战争爆发，《独立宣言》发布。1777年，谢里丹的《谣言学校》。1778年，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诞生了，伏尔泰去世了。伏尔泰是前面一个时期标志性的人物，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启蒙时期的巨匠。这也标志着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总能在时代交替的时刻看到标志性的事件；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卢梭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威廉·黑兹利特相对来说是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人物。

我们当时津津乐道的就是查尔斯·兰姆，他是英国一个比较另类的文坛领袖。以前的文坛领袖基本都是家境富裕的，像查斯特菲尔德（Lord Chesterfield）这种，靠自己出钱把所有的文人都聚拢在自己身边。虽然查尔斯·兰姆钱不多，家里地方也很小，没有豪华的大客厅，但是他有人格魅力。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和他交朋友，在别人那儿可能要吵得不可开交，但到了他这里大家都要卖他几分面子。他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刘备，比他有本事的人都甘于居于他的麾下，接受他号令。而且他自己也不差。我觉得即便是

到了现在，一提到散文就会想到查尔斯·兰姆，但是我感觉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是被低估了。这也和散文这一整个文类受到低估有关系。我们知道现在还是长篇小说发挥主导作用，因为长篇小说有最好的记录功能。而在文学作品的所有功能中，记录功能又是统治者最看重的一个功能。当然现在我们有更加有效的记录工具，所以现在最得宠的是电影导演，而不再是写长篇小说的，最来钱的也是电影导演。国家有点什么事就会找电影导演出来记录一下，而不是去找莫言让他记录一下。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工具不一样。在当时，长篇小说是记录功能最好的工具，当然也是最有用的。相比之下，散文一般是用来抒发个人情感，专门讲讲一些个人的爱好、情趣。换言之，就是没有用的东西。而我觉得这是文学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我看来，“没有用”的文学是最有价值的文学。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查尔斯·兰姆真的很了不起。他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林语堂等写的散文。类似的大散文家是真正感受到了散文这种文体的魅力，一种销魂蚀骨的魅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人在中国文学的话语权内是很不吃香的，甚至是被边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斗争的话语权，是受政治影响很大的话语权。这样一种审美观决定了评判文学的标准，所以这些人就得靠边站，散文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很有学识和才华的，很了不起。

● 沙龙拾萃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散文上，不约而同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四、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时代特点

1783年，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先声，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是美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1784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去世。最近我们高翻的学生翻了一篇理查·艾尔曼写的《王尔德的序》，里面就有说到，王尔德（Oscar Wilde）和塞缪尔·约翰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所以1784年塞缪尔·约翰逊的逝去，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塞缪尔·约翰逊在伦敦崭露头角，慢慢崛起的历史也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那这样一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实际上它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动向：个人的才华慢慢得到展露的机会，个人才华与他在这个社会能达到的高度之间的正比关系慢慢显现出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了——现在是炒作的时代，你不一定非得要有真本事，但是你要让人家相信你是有本事的，或者说你要让人家误以为你是有本事的。就像王尔德，他曾经到美国，有人问他：“听说你曾手握一朵百合在伦敦最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招摇过市，是不是真的。”王尔德听了之后说：“真要走，没什么，但要让别人相信你走过，这就厉害了，我愿意认账。”他就

是需要这样一个身份，他觉得这是一个炒作的题材，很好，多多益善。借用这样一个机会正好可以宣扬自己的思想，又有什么不好呢？

塞缪尔·约翰逊的名望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鲍斯韦尔。我们看到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你是我的鲍斯韦尔”，因为华生扮演的就是鲍斯韦尔的角色。塞缪尔·约翰逊和鲍斯韦尔两个人亦师亦友，鲍斯韦尔算是他的学生，把自己老师的轶事都记载下来了。

1785年，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出生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瘾君子自白》。英国能出这样一本奇书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也和英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当时，英国社会吸食鸦片还是合法的，这本书不是在全世界严禁毒品的大环境下写的。但实际上，吸毒这件事并不是不能重新考量的。世界上确实有人在考虑让毒品合法化，从而剥离凝结在毒品上的道德恐慌。实际上，人类为这种道德恐慌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英国整个上流社会都在吸食鸦片，德·昆西这本书就写了鸦片所能给人带来的欢乐和痛苦。就像现在摇滚歌手需要吸毒寻找灵感一样，毒品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大大刺激了那些沉睡多时的脑细胞。人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出来，各种各样的想象力会极为丰富。德·昆西当时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 沙龙拾萃

就是针对英国包括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也会吸食鸦片的社会大背景。

1788年，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出生。前些日子我看简·奥斯汀《诺桑觉寺》，里面在说到拜伦时大家都是万分崇拜的语气。当然其中有夸大的成分。我在读大学期间的文学老师就给我们表演过拜伦。在一个聚会上，拜伦一进门，那些贵族都会谨慎地把自己的老婆拉到身后挡住，不能让她们落入大魔头的眼中。1789年，在文学上，威廉·布莱克写了《天真之歌》，它和后来的《经验之歌》是一对。然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1770年威廉·华兹华斯出生，1789年时他19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所以他跑到法国参加法国大革命顺便谈了一场恋爱，两手抓。年轻的时候不革命是不行的，但是一把年纪了脑子里还在想着革命也是不行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有很多作家对此作出思考，比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了《法国大革命》。英国人其实对于这个隔着英吉利海峡的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关心，大革命时大家都在思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法国而不是英国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这是很难讲的。但对于我们这种从革命语境中出来的人，从小就经历过这样革命教育，我们的立场当然是偏向法国

的。像我小时候就有这种印象，觉得英国就是保皇党，是封建贵族的大本营，法国的贵族跑到英国去蓄积力量，准备反攻。现在想想，英国真是不错。曾经就有一本书专门介绍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平时吵嘴，你骂我我骂你，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老兄弟毕竟还是站在一方。当又有新的一代人来推翻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还是只有我们两个谈得来，虽然两个人作对作了一辈子。对于法国大革命，英国的作家一向是热衷于对其进行评价的，这的确和他们有着切身的关系。

关于法国大革命，雨果写过一本书我很喜欢，叫《九三年》。雨果在书中论述与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有些人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之后，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说：你们这些人把事情做的太过头了。但是雨果说，当时人们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的，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他们是在进行一场非常伟大的实验，一个变革，这的确对于整个欧洲的历史有一个推动的作用，他们是在尝试一些新的人类治理。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能实现百分之多少，的确很难讲。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有的时候需要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新付出一点代价。

然而还是应该说明，你是从怎样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我们中国人受到的教育，是会为了某种主义而牺牲掉我们个人的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认为个人利益是要

低于集体人民的利益的。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即使个人做出一点牺牲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不是说要义正辞严地要求你必须牺牲掉，而是让你自愿牺牲个人的利益——我们受到的是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社会有很多地方存在腐朽，但在好莱坞电影里面，不会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把这几个人牺牲了吧。比如说一个场景，飞机要发射导弹了，正在倒计时，然而还有两个人没逃离出来，怎么办？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个体为了集体的崇高目的而被轻而易举地被牺牲掉。斯宾塞的文学思想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也是一句堂而皇之的话，有的人很可能打着这个旗号肆意妄为，关键是要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当年鲁迅曾经说，他开始很迷恋民主，后来发现民主只不过是多数人的抱枕。这在中国后来的确可以看到，只要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比如说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轻易把一个人干掉了，诸如此类。总而言之，在你碰到以“人民”作为旗号的事，你就无话可说了。

1791年，詹姆斯·鲍斯韦尔最有名的著作《约翰逊博士传》。二十多岁的柯勒律治进了剑桥。1792年，雪莱诞生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根据苏联的分类模式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把雪莱、拜伦定为积极浪漫主义，而把华兹华斯放到消极浪漫主义里去了。可能当时编教材的人把华兹华斯当做反面教材来讲。年轻时候的革命者，老了竟然被招安了，接受了“桂冠诗人”这样的称号。所以华兹华斯在中国绝大多数学

文学的人心中形象不是多么的好。1793年同样发生了很多事情。法国对英国宣战，路易十六被处决。1794年，柯勒律治和骚塞发表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一剧。1795年，济慈也诞生了。济慈在英国文学当中地位很高，虽然只活了短短的26年。济慈的一生完全是为文学献身的一生，为浪漫献身的一生。作为浪漫主义的一个要素，爱情不能沦落到肉欲上面去。所以如果是精神恋爱的话，那就是浪漫主义的顶峰。我们在讲浪漫主义的时候谈到，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爱上了王后，只能远远地看，心中暗暗地想，一点都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人类所能追求到的最高境界的爱情。所以多少年来济慈的爱情都为人们所传颂。1796年，柯勒律治见到了华兹华斯兄妹。这两人的相遇是伟大的，就好比马克思遇到了恩格斯。二人一见如故，从此同心协力，开创了一番大事业。柯勒律治遇到了海兹利特，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讲，英雄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寂寞的，英雄就要遇到一个识英雄的人。从这一点来讲，柯勒律治遇到了海兹利特。海兹利特也不是那种科班出身、让人一看到就能联想到文学家的人。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的。托马斯·卡莱尔原来是教数学的，也是哲学老师，后来又去写法国大革命的书。

五、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包容气质

1798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二人发表了《抒情歌谣集》。1799年和1800年都波澜不惊。1804年，拿破仑称帝，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 沙龙拾萃

这里我将两条线串起来讲，讲英国的迷人的气质。迷人的气质有很多，我前面提到一点，现在我们仔细的讲一讲。我认为最为迷人的，也是我最看重的气质就是一种包容心。纵观十九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文人之间尽管也有相轻的现象，比如大家吵来吵去，在报纸上骂来骂去——这其实可以繁荣文艺——但没有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搞得你死我活。如果非要把不同政见的声音统一到一样的声音中，这其实是很不好的。

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受迫害的同时也扮演着迫害者的角色。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从“想要迫害”或者“把迫害作为统一意见”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悖论或者说思维的死角吧。在看待问题上大家要采取比较折衷的方式。中庸之道按理说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老发明，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的效果往往不是最好的。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英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大家都能够用一些非极端的方法，用一些非斗争的思维。

我们中国人对查尔斯·狄更斯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反映了工农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时判断一个文学作品是否有价值，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反映阶级斗争。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婆婆每次回家都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给我看。我当时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一拿到书，就问她：“这本书里面有没有阶级斗争？”这就是当时我的文学品味。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口味有多重。这是文学观在少年眼中的体现。我们会从阶级斗争

的角度评价一本书好看不好看。当时大家推崇查尔斯·狄更斯，都认为他反映了阶级斗争，觉得他的笔下主要反映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实际仔细分析，会发现他的确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自己的标签，比如工人、会计、书记员、记者等，但是他不描写这些人物工作上的事，而只有回家以后的事，都是共性的事情。所以他并不是很强调反映阶级斗争的事情。对他书中解决危机的方式进行归纳，发现他没有在哪本书上采取非常暴力的手段，反而是比较推崇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方法。比如穷小子爱上有钱人家的小姐，最后的时候，海外的叔叔给他一笔遗产，社会身份的鸿沟就此消失。其实这也是传达他的一种理想，他希望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比较热的一个词，“reform”——“you reform me”，你来改良我，其实是一个调侃。改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激烈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和我们现在说的概念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社会主义者，就想到暴力革命，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是搞慈善的，工人募捐之类的。

敢于追求“小”，这种精神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已经被人们接受了。一些“反英雄”，比如窝囊废、醉汉之类的小人物，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人们的关注点从大英雄被吸引到小人物的身上。当时女性地位也很低，职业选择很少，有演员、家庭教师、女佣等，要不就是卖鱼卖花这些社会底层的工作。这里面也包含一定的革命性。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说：男人适合

读历史、读传记，女人就适合读小说。她对当时各种流行元素掌握得非常娴熟。当时社会比较看轻女性，一些女性作家写小说，刚开始都要假装自己是男性，用男性的笔名。简·奥斯汀生前的女性身份并不为读者所知，她死后，她的哥哥给她发表作品之后，大众才得知她的女性身份。

十九世纪是各种思想层出不穷的年代，包括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工会运动等大人物大事件；也有许多社会民间的小人物小事件。写小说可以写大事，也可以写小事。十九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文学传统，体现了对无用的追求。小说开始去政治化不一定要与政治有关，不一定要与意识形态挂钩。对文学能够舍大从小，是很大的进步。这令人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中也有深意。很多作者家境不够好，生活环境较为艰难，但他们的文字都是很阳光的，没有表述对外界的敌意。只看他们的作品，觉得非常美好，难以体会他们生活的艰辛，但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之后，会发觉他们内心的美好，十分可贵。尤其是一些女作家，还会遇到出版商拖欠稿费的现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写出的文字这么纯净，尤其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和时代是相关的。我认为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我们有的时候研究文学就是要跳出大大小小的条条框框。作为一个人，要跳出人的框框，比如像华兹华

斯一样，要去尊重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去尊重自然中的生灵。在这些作家中，我们感受不到居高凌下的笔触，他们认为动物能与人交流，可以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安慰。而且华兹华斯也认为，人没有资格去占据大自然中的中心位置，人应该和动物和平相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伟大的。要跳出条条框框，把身边万物当成人类，这样人与自然才有可能和谐相处。所以我说，十九世纪是文学史上的最具有创造性的一段时期。

实际上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干扰着文学。按照中国的文学传统来讲是两分盘，有“文以载道”，或者是“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中有点风吹草动，自娱自乐的人就转变成一个工具，任由别人派给他活，他的激情野性马上就靠边站。但实际上，这样不好，不纯粹。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有时候如果它的有用性少一点的话，对它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王尔德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里，最好的形式就是音乐。因为音乐只有音符，里面很少会出现反动的因素。但中国人还是能在音符里分出“姓资姓社”来。我们要把文学当成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形式。

十九世纪的英国，我们称为是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时期的英国是非常辉煌的，在海外取得了非常多的殖民地，在外掠夺殖民地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的某些矛盾。斗争的本质始终是围绕着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僧多粥少必然会引起一些矛盾。外部殖民地财富不断地涌进，减轻了僧多粥少的情况。英国当时的阶级对立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强烈。这样一来人们过上了太平的日子。从而文学发展所受的干扰会相对小些。维多利亚时期维持大约一百多年的和平年代，对文学来说非常珍贵。

中国的历史上可能会有政治上的盛世，像康熙乾隆时期，但康乾时期也出现了压制文化发展的文字狱，因为当时是外族少数统治多数，文化上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态度。而英国的政治制度恰好是保证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国王与议会形成一种约束关系。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是非常尖锐，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众生平等的景象。从草根的角度来讲，出现一种民主意识，担当领导的人，必须要反应多数人的利益。英国当时的文学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卓越。

我们看看英国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
1896年，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写

下了《无名的裘德》，1897年王尔德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自深深处》，1900年奥斯卡·王尔德去世，1901年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这个时代就结束了。

六、小结

我认为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也是人类文学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原因归纳起来讲，可以总结为“有钱有闲”，殖民地掠夺来的财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的发展，充足的时间也是不可缺少的。政局稳定，物质财产丰富，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学从大的方向来讲说它出色是因为两点：有文字有思想，这两种事物同时出现。再者是因为这个时期有新有旧，和平过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完成了文学流派的过渡，从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又从浪漫主义慢慢转为现实主义，整个过程是对旧的文学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完成，没有决绝的断裂。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想再现这样一段辉煌时期是比较困难的。

电影中的哲学

主讲人介绍：

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哲学和宗教学。他开设的课程颇受同学欢迎，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已作为慕课（MOOC）登录 coursera。他被誉为“复旦哲学小王子”，2014 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宗教学，但我在复旦开了一个通识选修课，叫“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内容包括十部电影，每次讲一个哲学主题。今天这个讲座包含了我从课程中所选的四五部同学们接受度较高的电影，希望大家能够从讲座中了解下我们研究哲学是在做什么，考虑哪些问题。

一．哲学为何

大家可能认为哲学很不近人情，不接地气，或是高高在上，不说人话。其实哲学像黑社会一样，是有切口的。切口是有它的道理的，维护群体内部的认同和团结。这些黑化可以把某些问题表达得更为精准，避免那些圈外人士很轻易地进入到专业研究者的领域中，区别出局内和局外人。但是有些时候，哲学学多了也会有哲学病，不会说人话。所以我一直跟同学们说，既要用术语来表达艰深的问题，又要会向大众说话。

我先说明一下哲学“眼中体”。“眼中体”揭示了不同人群对同一事物的不对称的理



解。如藏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的画作《雅典学院》，位于图中最中央的柏拉图一手指天。孤芳自赏的做哲学的人，就是这

样的想法。但是社会大众对哲学有很多偏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处在象牙塔中，而普罗大众则离他们很远。这个鸿沟不是一两天可以弥补的。绝大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是中学教科书式的，诸如“世界是物质的”这般简单的唯物主义理论。但是专业学者不会这样说，因为这是某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仅是整个西方哲学理论中很小的一部分，更不用说中国、印度及其他文化圈中的哲学传统。

激发我开“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想做哲普工作，哲学的普及。我的长远目标是我们谈论问题时是需要哲学的思维能力和背景知识的。我把哲学的形象归纳为枯燥、傲娇、孤芳自赏，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崇高理想的坚持。当我备课时，我发现现在的哲学是学院哲学，即写论文的方式，非常的枯燥。但在哲学的源头上并非如此。我们会发现柏拉图笔下的哲学比现在的哲学要生动很多，语言方式也更多样，包括对话、隐喻、独白和反讽等等。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也包含了很多诗意的语言，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等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我认为哲学存在一种遗忘。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到源头上，来弥补这些空白呢？

追根溯源，看看最开始的时候，哲学和电影会发生什么关系。其实这样的问题有点像“关公战秦琼”，是完全两个时代，两种属性的东西。电影于 19 世纪末诞生的，而哲学则拥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所以 100 多年的电影遭遇了 2000 多年的哲学，就相当于一个孙子辈的事物碰到了爷爷辈甚至是曾祖辈的学问，两者不对称。想象一下，如果 20 世纪之前的哲学家穿越到现在会如何看待电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绘画以及一般的模仿艺术，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

是在和我们心灵里的远离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真理为目的地在向它学习。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如果发生穿越，最早的哲学家估计会对电影作如此低评。模仿艺术是指用眼睛看的艺术，在当时主要包括绘画和诗歌。模仿艺术建立在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柏拉图曾有这样的结论“艺术具有腐蚀性，诗人和画家应当被逐出城堡”。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接受他的结论，更重要是去看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推导及论证。柏拉图坚持他的“理念论”，把所有事物分为理念、事物、艺术三个等级。如果柏拉图穿越到现代，除了对电影感受到文化上的震撼外，他在坚持“理念论”的基础上对电影的评价也不会太高。这里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西方哲学的祖师爷非常不待见电影。这不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我个人的立场没有这么绝对，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谈电影中的哲学思辨问题。

二、哲学与电影

接下来我们谈谈所有哲学导论中必问的问题：什么是哲学。我不想用定义来回答这个问题。字典上的定义过于学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我们先看看这个词源，来自希腊语，由两个词根组成：友爱+智慧。合在一起就是“爱智慧。”我要说的是，它既不是单纯的“爱”，也不是单纯的“智慧”，而是一种趋向性，是不断接近智慧、寻求智慧的过程和动作。我下面要引一段德文，别的

语言表达不出这样的意思：“Philosophie kann man nicht lernen, man kann nur lernen zu philosophieren”，这句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家康德所说，他在德国哥尼斯堡生活了一辈子，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可以被称作哥尼斯堡的老宅男。他如此之守时，每天中午吃完饭出来散步，以至于有一次迟到了，使全城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以为是钟坏掉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是不能学的，人们只能学习去进行“哲思”。既然哲学不能学，那哲学系是不是得关门呢？其实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哲学不是一种具体知识的传授、传递和领会，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思维上的锤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哲学更多地接近于体育运动或武术，需要很多操练，当然这些操练是在脑子里进行的。

我们再回到古希腊，看看柏拉图是怎么说的。他认为：“哲学始于惊讶。”为何这样说？我的解读是，哲学并不是一个原发性的东西，它也是受到推动的。哲学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缝里蹦出来，而是人们受到生活环境、生活境遇的影响和启发，给你动力去追问一些在生活中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问题。哲学的主题并非哲学所特有，不被哲学所垄断。哲学之所以能讨论这些主题，恰恰是因为人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持有共同的生活理念。由此，电影和哲学有很大交集，因为电影也涉及人们的最基本感情、生活、理

念，等等。

下面例举一些电影：首先是《泰坦尼克号》，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以及国产电影《大话西游》，典型的过度阐释。但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当然还有其他主题的电影，例如《肖申克的救赎》，表达了“什么是自由”的问题，同样也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当然电影会把它表现地更有戏剧性，如：《勇敢的心》中主人公最后被处以极刑前还高喊一声“自由”。当然还有一些很沉重的话题，非常晦涩的话题，比如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后来被翻译成《窃听风暴》），“他者，他人”也是哲学中常常讲到的主题，女主人公知道自己全部的生活都被监听后选择死亡。穿越阴阳两间的爱情故事《人鬼情未了》表达了面对死亡、克服死亡这种话题。还有讲述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情感（除了爱情，不一定全都是友情）的电影，如最近很火的《超能陆战队》、《杀手》等——丰富的感情是哲学和电影都要讨论的主题。《阿甘正传》中，阿甘为什么要跑？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跑是愚蠢且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也引出了哲学当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人为什么而活着。还有小众化的电影如《大卫·格尔的一生》，这是仅有的两部以哲学老师为主人公的电影之一，它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关于正义讨论的电影如《闻香识女人》、《V字仇

杀队》等，虽然后者不一定是正义，却启发我们如何建立正义、争取正义、维持正义。当然还有一些美好的、最基本的关于真善美的电影，如《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另一部与二战有关的电影《美丽人生》，父亲隐瞒儿子，让孩子心存美好的愿望，这也是追求善与美的表现。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分支学科是认识论。在认识论中会讨论真与假，这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更加戏剧化的表现，比如《楚门的世界》，真假已被混淆；以及《搏击俱乐部》，其中的真与假很少有哲学上的解读。电影《死亡诗社》中出现比较尖锐的问题：关于对与错。《七宗罪》中男主角无法抑制自己对杀手的愤怒，最终杀死了对方，犯下了“错”，在哲学中，对与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电影和哲学最终都需要给人们一个希望和未来，不管是以乌托邦式还是反乌托邦式的方法呈现。电影中常常会有快乐的结局，而哲学则是要在问题的最后给人指一条明路，否则哲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这些都证明哲学的问题并不是哲学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都会碰到的。但很多人认为哲学是门苦大仇深的学问，这跟罗丹所著的“思想者”的雕塑有关，我认为他不够懂哲学。我们往往思考哲学问题时不会这样愁眉苦脸，尽管有些问题千百年来一直都在被询问而从未被解决。有时候在电影中

会出现一些哲学上称之为“思想实验”的做法，比如“滑车的问题”：失控的矿车若按照原来的轨道走会轧死五个人，让扳轨道的扳手把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就会轧死一个人，或者将天桥上的胖子推下挡住矿车，五个人就不会死，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这类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再比如，忒修斯之船，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一部分。问题是，最终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当代的语言哲学会用极端的思想实验尝试解答哲学问题，在电影中这样的做法也非常多，而且电影的方式会更直观、更有趣，两者又有共通之处。因此哲学和电影并不是非此即彼、彼此不待见的一对。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我的一种解释。

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洞穴领域，这个洞穴领域在各种学科中也会讲到。这个洞穴领域也是一个思想实验：第一部分，有一个山洞，山洞中有一群人，这群人从小到大都被铁链子拴在里面，没有离开过这个山洞。他们前面是山洞的一面墙或者岩壁，他们始终只能看

到这个地方。他们身后是一个火堆，作为山洞里的光源。在光源旁，有其他人拿着类似皮影的东西晃。光源照到这些东西上，影子映在岩壁上面，被铁链拴着的人一辈子只会看到这些影子。

第二部分，柏拉图提出：假设现在突然有一个人，他跑出去了，跑到外面，而外面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蓝天白云、和风细雨。那么，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个人会作何反应？一开始他肯定会觉得他的眼睛受不了外面的光，但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里面的世界是虚假的。现在大家看这个洞穴领域的布局，很像什么？（答：电影院）对，就是个电影院嘛。我们通常认为，电影院中的都是假的。电影院是一种典型的洞穴领域，这是就第一重理解。但柏拉图的故事还没有完。洞穴领域还有一波三折，还有第三部分。

那个有机会逃出去看到真实世界的人，如果他再回到洞穴，他会跟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洞穴的人说：你们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在外面。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里面的人肯定不相信他，甚至会很愤怒。出去过的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他就会永远被这个群体排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波三折很有意思，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洞穴，又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电影院。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这

样说，我们都知道电影是假的，我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觉得电影上面演的是真的，但是真跟假之间，有的时候恰恰是反过来的。正因为假到了一定程度，反而能够传递出某种真理，传递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东西。它虽然真实，但却平庸，以致于我们遗忘了那些真实的东西。这种关系很有意思，在这样一种对洞穴领域三重的解释中，在这样一个囚徒、离开、返回过程当中，电影就可以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它让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到电影屏幕上不真实的东西，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又恰恰把我们推到一种极端状态，让我们回想起、甚至再领悟到某种最真实、最本真的东西。

三、电影中的哲学案例

第一个案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三部曲，我重点讲第一部。1999 年出了第一部《黑客帝国》我当时正读大学，看完之后很兴奋，连夜和同学讨论这部电影。因为已经是 1999 年的片子，大家可以大致回忆一下《黑客帝国》的场景。电影的男主角叫 Neo，女主角的名字叫 Trinity，Trinity 的名字很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三位一体。电影中，男主角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平庸的白领，天天西装革履，在办公楼里面上下班。然而，突然有一天他发

现这个世界不对。包括 Trinity 在内的解放组织出现了，先知告诉这些组织成员 Neo 是他们的救世主，必须把他从 Matrix 里解救出来。

Matrix 就是人被当做电力来源被放在一个类似胶囊的东西里面，所有人的脑子都通过电管连接到电脑上。Neo 认为的正常生活都是通过一个超级电脑模拟出的虚拟现实。事实上，所有人都像一个个胶囊一样，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母体当中，所以这个电影叫 Matrix。

这个电影的基础设定在现在会被称为虚拟实境，或者说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它不是一个大屏幕，而是一个眼镜，戴在你的头上就可以模拟出巨大屏幕的环境。那么，有没有可能到一种程度，它投射给你的虚拟环境，你已经没有办法区分这是 real 还是 virtual（谷歌眼镜与谷歌隐形眼睛是这个方向的技术）。如果没有办法区分这两者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其实很多科幻电影都在谈这个问题。

在 1999 年的时候，电影还没有办法用更好的视觉语言来表达这个虚拟实境，所以电影中会运用拍一连串绿色的数字从上方掉落下来来表示这个虚拟实境。Neo 拥有特异功能，他能够看到追杀他的 Mr. Smith，而 Mr. Smith 使用一套类似杀毒软件程序一样的东西来捕杀他。当时只能用这种视觉语言来呈现，而在技术上我们把它称为虚拟实境

的问题。很快，十年、十五年后这种技术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那么在哲学层面上，虚拟实境有什么意义？

此处引用 1981 年美国哲学家普特南的一段话，当时计算机还不是那么普及，这段话很有意思：有一个人的大脑被放进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依照程序向脑传输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他来说，人、物体、天空都还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可以输入。这个大脑还能被输入或截取记忆，他甚至能被输入代码，感觉他自己正在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说到底，我们对外部的所有的感知无非都是通过五官，但是按照这个虚拟实境的想法，所有的五官的信号最终都会转成为一种电信号来刺激我们的脑部，我们所有的五官都能够通过这种电信号来模拟。普特南写在 1981 年的想法和 Matrix 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讲的是一回事情。而在哲学上，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缸中之脑或者钵中之脑 (brain in a vat)，这就是这位普特南哲学家提出来的。他也是比较极端的，他假设只有一个大脑，而没有其它的肉身。但我们有办法让他存活下来，用电极插在脑当中，一台计算机模拟他在运动、走路等环境。其实他没有身体，但是还是能够模拟让脑以为他在运动场上跑步或者走路。这

类缸中之脑的问题，其实在 **Matrix** 表现得十分的彻底。

于是就可以导出在哲学上认识论的问题，外部世界是真实的吗？或者，我们怎样证明外部世界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哲学问题，而且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中，这个问题也在反复地出现。一些电影比如《源代码》（**Source Code**）和《盗梦空间》（**Inception**）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心理学的解释，但心理学的解释不是那么彻底，根本上还是哲学的问题。

但这并不表示哲学家始终在怀疑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个温和的实在论。之所以我们会追问这些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困境：当哪一天虚拟实境实现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真实。而且就像在 **Matrix** 当中，第二部中的一个人，他被解救出来了，脑后的管子被拔掉了，但是他最终选择回到母体当中去。他说：当我在吃一块牛排，但我无法区分这是一块真实的牛排、还是电脑给我的一串代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单单选择这个牛排？因为，出去的生活是不稳定的，**Matrix** 之外的世界是不稳定的，他需要斗争，甚至会被机器乌贼所猎杀，可能很快就会丧命。那么，他为什么不生活在梦境当中，虽然是假的世界，但是能给他幸福感。这是一个重

大的人生选择，也是一个哲学追问。就是这个认识论问题背后的意义。

第二个要介绍的电影，叫《战略特情组》（**Unthinkable**）。电影中，男主角是 **CIA** 的刑讯专家，他最大的本事是用刑让别人把话吐出来。电影中另一位主角是一名恐怖分子，名叫尤瑟夫。当然他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他是一位美国公民，曾是特种部队的成员。电影中，他偷来了很多造原子弹的钚，并且自己造了几颗原子弹，放在美国的大城市里。在这之后， he 被抓了。电影设定是原子弹会在 72 个小时后被引爆，几千万人会丧生，所以 **CIA** 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尤瑟夫说出原子弹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刑讯专家就登场了。所谓刑讯专家，就是可以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信息。比如在这部电影里，男主角用斧子砍掉了尤瑟夫的手指。电影是限制级的，无法上映。但这这部电影中，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可不可以折磨所谓的恐怖分子。这个电影有一个大背景，就是 911 之后小布什发起的反恐战争这一背景。反恐战争中被抓来的人不能被称为战俘（**POW, prisoner of war**），即不受日内瓦公约限制。日内瓦公约规定，如果两国交战，在宣战之后被俘的人员就是战俘，而对战俘的人权要有基本的人道保证。但所谓的反恐战争，是没有国家对国家的概念的，也就没有一个宣战的过程。因此，在

现实的反恐战争中便爆发了许多虐囚丑闻，如 2003 年的阿富汗阿布格莱布监狱。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如美国关塔那摩监狱里面便还关着许多这样的所谓恐怖分子。这部电影表面是可不可以虐待战俘问题，深层次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道德哲学最基本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分别对错，什么是正义和正当。对尤瑟夫采取酷刑，符合“最大幸福原则”。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等价原则”，即承认每个个体都被认为具有同等价值。还有就是快乐与痛苦可以相互换算的，痛苦仅仅是负的快乐。所以折磨尤瑟夫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但是可以折磨恐怖分子的老婆孩子吗？这就是一个道德选择。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实验，里面包含了滑坡论证，虽然是一个谬误，但在思想实验里是可以成立的。把情况逐渐升级，让我们理解功利主义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对功利主义质疑的原则集中体现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上。电影描述诺曼底登陆后，瑞恩家 4 名于前线参战的儿子中，除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仍下落不明外，其他 3 个儿子皆于各地战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得知此事后出于人道考量，特令前线组织一支 8 人小队，在人海茫茫、枪林弹雨中找出生死未卜的瑞恩，并将其平安送回后方。整个片

子建立在对功利主义的否定上，为了救一个人，牺牲了小队里的所有人，并不符合等价原则。在深层次上，在伦理学上、道德哲学上，我把这个称为后果论和绝对论的冲突，绝对论又被称为“义务论”。功利主义是典型的后果论，看重结果；义务论，则看中行动的意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不同的哲学立场，在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分别持两种观点。后果论的代表是密尔和边沁，义务论的代表康德，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里面提出义务论，“善的意志并不是因为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为它适于达成任何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为意欲”这句话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义务论者。

这个就是康德的立场，很崇高的；康德说：两样东西让他久久不能安息，一个是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他是个典型的义务论者，你要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他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你要想想是不是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其他人都可以，那么这个就是善的，他才能成为绝对。由此派生出，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你是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一个其他人格人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这个被称为人性论者。

第三个电影《她》（Her）。这里面有一个哲学问题，跟图灵有关，图灵曾经提出过

一个原则，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与人类展开对话而不能被辨别出其机器身份，那么称这台机器具有智能。你跟一个机器对话，你看不见它，你已经分别不出这个机器是人还是机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图灵很早就预测到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到这一步，而人无法辨别它。这不是科幻，从图灵提出图灵测试一直到现在，全世界的黑客、程序员都要想写一套程序来通过图灵测试。去年有一套聊天程序叫“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是俄罗斯的一个天才少年和另外一些人一起写的，第一次通过了图灵测试。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此事对人类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假设有一个 AI 它假装通不过图灵测试怎么办，它已经聪明到这种程度。我们最近在微信、微博上经常看到在传一篇文章，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包括做互联网的像比尔·盖茨、霍金等他们都在警告人类，在未来 15 到 20 年内人工智能会有一个突破，一旦超过这个 G 点之后，人类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人工智能了。

今天讲的最后一个电影，跟前面的都不一样，它是一个传记篇，这个片子叫做《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这个电影是根据《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本书讲汉娜·阿伦特的一段生活。阿伦特在 1963 年写了这本书，艾希曼是一个纳粹军官，他在二战刚开始时参与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叫做缙胡会

议；在缙胡会议上纳粹的头目要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要把整个西欧的犹太人给杀掉，种族灭绝，他是当时这个计划的直接制定者。但二战终结的时候他没有被抓起来，他逃掉了，他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但是到了 60 年代初的时候，以色列的情报机关非常厉害，就知道了他的下落并派出了一个行动小组，把他绑回了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政府还是有一种很强的复仇心态，要审判纳粹军官艾希曼，而且要通过一个正当的司法程序给他一个罪名，这才是一个正义的彰显。我们知道阿伦特在 30 年代，纳粹获得政权之后她就逃走了，她先逃到巴黎，在巴黎沦陷之后又逃到了美国，后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其实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没逃出去，都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她全程目击了艾希曼的审判，写成了这本书。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让全世界的媒体包括阿伦特都很不能接受的一个情况，当法庭提出很多对艾希曼的指证的时候，他的脸上竟是一种狡黠的微笑，他在面对这样一种反人类的指控时，他所有的抗辩都是无条件执行命令。艾希曼说：我是职业军人，职业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如果你要追究一个职业军人的法律责任的时候，那么人类社会也是要垮台的。他用一切都是执行命令这个借口来反驳所有对他的指控，某种程度上他对法庭以及审批都是很轻蔑的。在目击了整个庭审之后，阿伦

特并没有做出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她说：我们 20 世纪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恰恰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就是，艾希曼绝对不是一个撒旦似的大恶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的平庸就在于他非常机械地毫无保留地去执行那些命令。这种恶、这种平庸恰恰造成了后面这种非常巨大的恶——600 万犹太人被杀。阿伦特有这样一段话，她把 20 世纪的思想特征归结为“无思”——不思考问题。当艾希曼在执行一个命令，他不会去思考这个行动本身的善与恶、正当与非正当、道德与非道德。阿伦特的原话是：“什么叫‘无思’呢？没有头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的背诵以变得琐碎空洞的争鸣，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她绝对不仅仅是在说艾希曼这个人，而是在说 20 世纪、21 世纪的普遍特征，她也不仅仅是针对纳粹集权的政府，而是世界上很多政府，很多人都在按照无思的状态在过我们的生活。这是阿伦特在人的挑战中的一个很有名的判断，正因为她用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来指责，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而是在批评艾希曼。阿伦特做了一个典型的哲学和社会上的批评，他并不是简单地谴责艾希曼，而是要分析背后形成的机制和机理，那才是最深刻的批评。

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不仅是在战争中会出现，像我们现今的人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处

在无思状态。互联网刚刚发明的时候，美国人开玩笑说，你聊天的另外一头有可能是一条狗。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宁愿把自己变成一条狗，或者主动选择把自己变成一条狗，说一些不经大脑思考、不负责任的话。最后，我想通过讲座等方式，一方面让大家了解到，哲学现在在干什么；另一方面，达成电影跟哲学之间的和解。我们现在很多哲学家在批评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比如微博上任何一个小明星，发一条吃东西的状态，都是几十万条的回复。但是哲学家说话，没有人理会。并不是说我希望哲学家说话也有几十万条回复，而是哲学家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的声音也应该被传达出来，通过某种渠道，比如电影，让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听到。它并不完全是娱乐，很多的思想实验、很多对人的价值、基本的真理的追求，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摆脱娱乐至死的状态，不需要把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怎样达成这种境界？在此向在座各位推荐一本书，《哲学与幼童》。哲学家提的问题好像都是不靠谱的问题，但我们要保持一种婴儿的赤子之心，才能提出一些很根本的哲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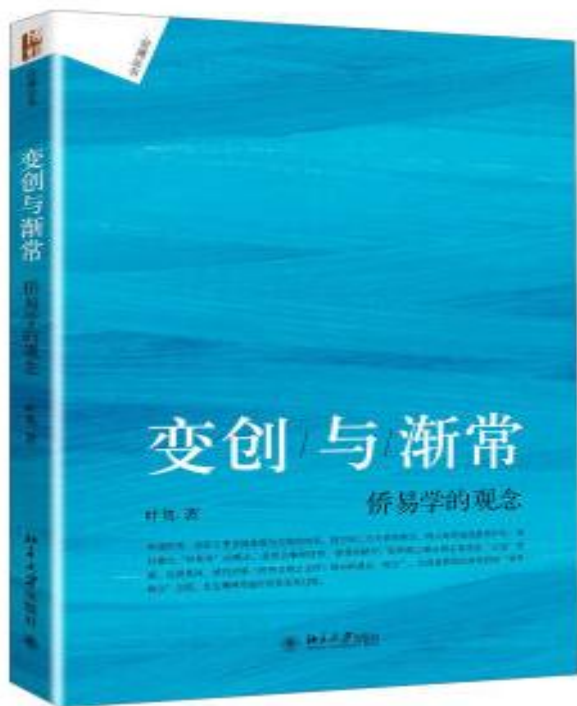
【问题精选】

学生：关于您提到的娱乐至死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后现代的人会出现娱乐至

死的状态？娱乐至死是不是也代表现在的人已经都碎片化了？人是多元主体，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主体性的危机。

郁喆隽：对任何这种口号式的判断很微妙，包括哲学。我刚刚说哲学要给人一个希望跟出路，但很吊诡的是，哲学家可能也陷入到时代的本身的特征当中。我一开始就说现在学院哲学陷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傲娇的状态，就是一种碎片化。哲学家好像只管学院哲学，类似于经验哲学，而不管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很多哲学家不知道常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曾经看到一个统计，大学教授，尤其是哲学教授是最容易受到电信诈骗的人群，因为大学教授过着一种跟常人很不一样的生活。这里还有社会学的理论，就社会分化来讲，我们现在的社会分化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仅仅是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亚文化又是非常的多。回到娱乐至死的问题，一个基本情况就是我们有大把的时间给空余出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前古人的娱乐就是吟诗作对，天黑了就只能睡觉；而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怎么打发掉，这是很多哲学家考虑不到的。我们现在会把生活截然分成两块，一块是电池在放电，就是所谓的工作；另外一块时间我们称之为休闲。这样的二分也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苦，每个人都想逃避工作；娱乐的时候我们又很任性，包括现在文艺青年喜欢旅

游、晒美食，这是某种逃离，这种二元对立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这样的逃离。我们把休闲当中做的事情称为娱乐，它跟工作截然独立。很可怕的是，娱乐往往被资本绑架；这个市场和消费文化使得我们似乎不花钱很难获得快乐。我们的消费，包括买东西、逛街、甚至电影本身都是不由自主的。比如超市里货架的排布，有特定的销售和市场的道理。这种不由自主地追求热点的心态，是一整套洗脑机制。我是做宗教学的，所以对洗脑这个词很慎重；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市场对我们洗脑非常严重，这可能是造成现今娱乐至死状况的很大一个因素，而且很难逃避。我跟我的同事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扪心自问，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是不是没有工作了就是我们的理想生活状态？我曾做一个思想实验，问一个正在读高三、学习压力很大的亲戚，假设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你能干什么？她就傻掉了。她说如果真给她这三个月，她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像那个任性的女教师一样，“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同样的问题我问在座的各位，假设给你这种积极自由，你会做什么？我听了很多人的回答，他们想做的事情无非是现在下班之后做的事情，这一点本身很耐人寻味。而且在我现在看来这个现象很可悲，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很贫乏，贫乏到给你自由你也不能挣脱束缚，这是这个时代平庸化的结果。所以大家不妨做白日梦，敢想才能敢做。



本期书目

作者：叶隽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1-01

【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异察变寻】

——对“侨易学”研究的一些看法

上海外国语大学 乔国强

叶隽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了“侨易学”的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架构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李石曾在《侨学发凡》中提出的“侨学”；二是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思想源泉或被誉为“大道之源”的《易经》。前者是一门“研究侨移、升高、进步的学问”，关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标示的一切现象”（李石曾：《侨学发凡》，见《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1980年第296页；转引自《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3页）；后者辨析“易简”、“变易”与“不易”。从这两个理论依

据中不难看出叶隽创新的胆魄和宏大的理论视野。他不但提出了“侨易”理论的架构、研究方法、规则性等问题，而且还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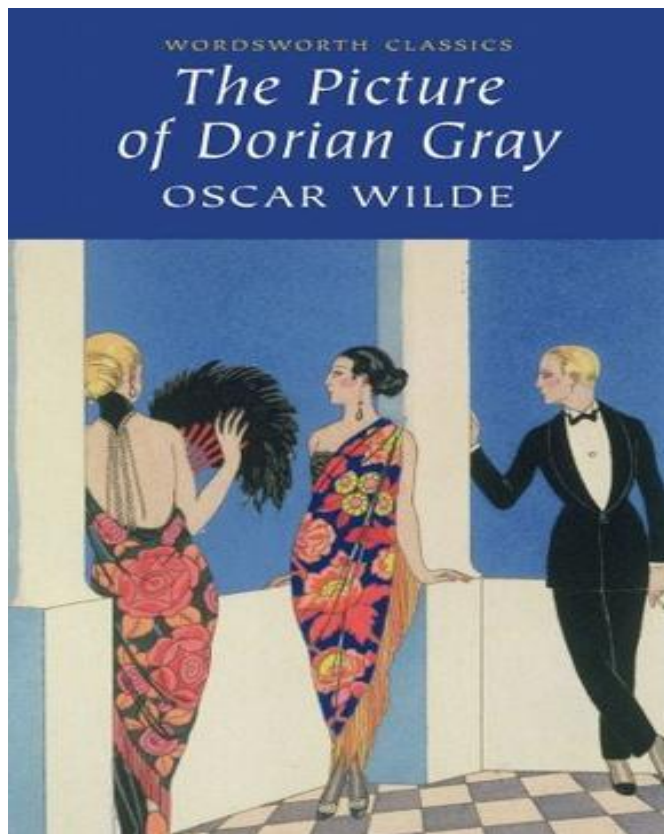
以我粗浅的理解，叶隽提出的“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 21 页）的“侨易学”思想，似可通俗地解释为，通过观察人们在移居异地及其过程中（侨）所发生的言语行为和精神面貌变化（易）的现象，来研究属于不同文化子系统的人们在这“易”过程中，所发生的互动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转变和新建立起来的思想、言语行为乃至文化模式。这种研究所关注的不仅是“侨易”之后的结果，而且还看重由“侨”而“易”的整个过程。《易经》讲究起、承、持、转、合、极六个过程，“侨易学”也注重“侨易”的整个演变过程。

《易经》在阐释与人相关的“易变”道理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易变”的主体；叶隽“侨易学”关注的也是这个主体，叶隽也称之为“侨易”的研究对象。他说：“所谓的侨易对象，就是侨易主体，乃是在侨易过程中发生主要质性变化的对象。”（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 37 页）从所观察的对象来看，“侨易”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家就移民问题提出了“同化”（assimilation）和“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强调作为少数民族的移民完全融入移入国的主流社会；而后者则表示移居他乡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社会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并对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易变”，这与“侨易”研究的对象或主体是相一致的；而“文化移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双向”的“易变”，比叶隽提出的“侨易”研究多了一个“客体”，即“文化移入”研究所关注的那个“移入”的主体对作为主流的客体的影响。有关这一点我们从美国犹太移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中可略见一斑。如果叶隽能把这一问题融合到其“侨易”理论中，或许将会更有说服力。

从叶隽所提出的侨易学的理论分析模型（即“”）来看，“侨易学”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侨易”，或至少在他看来，“群体性的侨易学分析，不太容易做到”（《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 35 页）。我以为，假如一个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个体，那么这个理论的有用性是有限的，或至少其广延性是狭小的。

好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 19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百年间见证的三次犹太移民浪潮来看，叶隼提出的分析模型并非只能用于分析个体，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群体。假如我们运用侨易学的分析模型来研究美国犹太移民这个群体，会清楚地析出他们带有取向性的“侨”和由此而产生质变的“易”。早期的美国犹太移民从欧洲，特别是从东欧国家历经“从边界到港口”、“底舱的煎熬”、“埃利斯岛”等过程，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他们在登陆美国后几乎都经历了美国著名犹太学者欧文·豪所说的那种“第一次冲击”：“来美国时心怀热望，现在有的人士气陡降，其他人则一蹶不振，问题倒不在乎他们的物质条件恶劣——毕竟他们早已经适应了它。更严重的是那种时刻萦绕着他们生活的精神迷茫。”（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68 页）这里所说的“精神迷茫”其实就是指这些犹太移民，因位移到一个异质物质文化环境里而开始发生诸多精神质变中的一种。这也就印证了叶隼所提出的侨易学分析模型也是完全适合于分析群体性的“侨”和“易”的。

不过，可能还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用于个人的“侨易”研究，还是用于群体的“侨易”研究，这个分析模式似还应该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统筹考虑，如从“侨易”时间来研究“侨易”的时代特性，或从“侨易”的空间来研究“侨易”的区域特性等。总之，“侨易”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自然诸多方面还有待于完善，但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都是我们可以承认的。



下期书目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Oscar Wild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胜忠

在王尔德生活的 19 世纪晚期，他本人及其唯美主义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都备受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其人其作感兴趣。

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王尔德将审美与哥特式风格融为一炉，“将哥特审美化并使审美哥特化”；就这部小说而言，王尔德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或者说，他是身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在小说中，他既塑造了道连·格雷这一令读者爱恨纠结的独特人物形象，又就他的唯美主义观点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尤其是小说的序言，可以说，这个简短的序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观点的结晶。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或其小说人物的话语中不乏悖论与反讽，甚至“谬论”，其观点也矛盾丛生，模棱两可。例如，小说所反映的“灵肉合致”——“肉的灵化，灵的肉化”——等思想需细心辨析。此外，王尔德似乎主张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

● 主题书评

艺术再现生活，因此，他的人生就是一件精美而奇异的艺术品。小说中的亨利勋爵和画家霍尔华德代表着王尔德本人性格的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妨从小说的人物分析中来了解王尔德，并从王尔德其人其言来读解他的这部小说。

你了解什么是唯美主义吗？你想知道唯美主义艺术主张下的小说创作是怎样的风景吗？你想窥探书里书外的王尔德吗？你想欣赏作者犀利、幽默、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语言风格吗？…… 如果是，那你还等什么？抓紧研读王尔德其人其作，并参与讨论吧！

特别提示：别被这个离经叛道的家伙给诓骗了！

以质疑精神激发学术热情， 以学术热情驱动研究创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炜炜老师访谈实录

采访对象：

张炜炜，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02 年至 2006 年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 年 6 月保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专业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008 年至 2013 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师从鲁汶大学语言学家 Dirk Geeraerts 教授与 Dirk Speelman 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2013 年 9 月回国，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已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晨光计划”，现为欧洲语言学会（The Societas Linguistica Europaea）会员、隐喻研究与应用学会（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会员、国际认知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会员。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于使用的转喻变异统计建模及可视化研究”。

Q：张炜炜老师，您好。我们看到您本科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专业学习，硕士也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后来博士在鲁汶大学也从事语言学方向的研究。请问您是怎么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的？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和研究语言学这个领域？

A：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机缘巧合，当时我们是北航的英语专业的本科，那年保研的时候，基本上本校保研的就直接保送给语言学专业了，当时北航的英语专业是有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几个方向，但基本上当时保研的时候老师们就直接把我们保送到了语言学系，所以一开始方向，其实是老师定好的。

我本科论文是写的文学方向的，但是我当时用的是系统功能语法的题材分析。然后 06 年的时候北航当时请了包括 Geroge Lacoff 在内的一些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来做讲座，那个时候我刚好大四，听了讲座之后非常感兴趣。当时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在很早的时候，能够接触到国际的这种认知语言学的大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就选了认知语言学作为自己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硕士期间，在北航修了一系列认知语言学的课，我们当时是两年制的，课程主要在第一年。第一年修课学下来之后，我觉得对隐喻、转喻理论比较感兴趣，我们当时也有修认知语法等等。所以后来出国读博士也是

● 访谈实录

这个方向，其实是硕士课题的一个延续。在鲁汶大学接受 Dirk Geeraerts 教授与 Dirk Speelman 教授的指导，也是认知语言学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

去了鲁汶大学之后发现我所在的研究组比较偏定量研究，比较偏计算方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在补这些基本的技能。后来博士毕业就直接回国来到上海。

Q：您刚才提到鲁汶大学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面侧重使用量化、计算的方法，那么他们对博士生的培养是否也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呢？您在攻读博士期间最大的感悟或者说收获是什么？

A：在鲁汶那 5 年我们是不修课的，我们直接是 research，直接是项目制的。有点像手工作坊的感觉，跟着导师做项目，老师傅带小徒弟。我有两个合作导师，还有很多师兄师姐，手把手的教一些基本技能。所以就我们这个专业而言，对于方法论、对于技能的培养和训练是非常的系统 and 完善的。我去了之后，导师就告诉我有哪一些方法和技能是你需要恶补的，他可能也觉得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比如说编程、统计、数据处理等等，还包括英文的学术写作都需要系统地进行训练。

我们博士因为没有课，他们硕士课我也不能够去听，因为很多是荷兰语讲的。有时候我们就利用其他学院的英文讲授课程，然后是短期培训，去学习这些方法。比如可以去统计学系，参加他们的 workshop，把统计的技能提高起来。或者去计算机系去看看编程方面的内容，是一个跨学科的选修与

旁听。我刚去的时候我的导师对理论方面的要求并没有太多，并没有让我读太多理论方面的书，前两年基本上都在给方法论打基础，都是研究方法的学习。我现在能够用到的方法，包括数据处理的一些技能，基本上都是从两年学的。所以对于研究方法的训练使比较完善的。

Q：我们看到您现在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包括：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词汇语义学、语言变异及变化。那么您现在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和工具有哪些呢？

A：我主要做认知语言学，而现在认知语言学也有一个向实证转向的一个趋势。而要做实证研究，无外乎就是两种数据来源，一种就是心理学的实验或者神经实验，还有一种就是观察性的数据，通过就是语料库来做。

我们那个研究组（定量词汇学与变异语言学（Quantitative Lexicology and Variational Linguistics））是以语料库为主的，我们不太做心理实验。我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真实语料，然后进行定量分析，一般会用到一些数学建模、数值模拟的计算等等。因为你的数据是有限的，只能基于有限的的数据做一些模拟，尽可能使有限的的数据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组的传统，因为我那个组是研究定量词汇学与变异语言学，所以定量是一个特色。我现在做研究基本的思路就是，找到一个有感兴趣的研究点之后，提出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阐明理论基础，之后就要去想一个操作性的问题。也就是如

● 访谈实录

何设计整个实验或是整个研究。而田野调查和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我用的不是太多。我还是用语料库比较多，通过数据统计，包括一些计算。

Q: 听完您的介绍，感觉您的研究对于数理基础的要求比较高，在为语言学定量研究打好数理基础方面您有哪些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A: 我虽然本科是英语专业，但是当时我们要求修微积分、概率统计和线性代数等等，是必修课，而且难度还不低。我们当时选修课也有 C 语言编程，做网页等等一系列计算机的课，我们也有选修。我大二的时候还辅修了，经管学院就是北航的应用统计学，所以从编程和数据处理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之前也修过相关课程。我去鲁汶大学之前不知道这些和语言学有什么关联，在读博期间发现这些原来和语言学研究是相关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环境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导师、同事讨论。另外在研究组中跟着导师做项目，可以一边学一边做，有问题可以向同门请教。除了看书之外，会有很多 hands on session，很多实践的机会。是问题导向的，就是你有问题你要去解决它，那你要把这个程序写出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报告，到最后程序写出来很漂亮，数据回来做分析，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然后在完成这个具体的案例的过程之中，你各方面的技能就得到了训练和提高了，同时还有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解决问题。

Q: 对于之前数理基础比较薄弱但是希望能在自己研究中使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同

学和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A: 我的建议是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并不需要追求把所有的统计学里的方法都掌握。可能刚开始，需要与你所研究的领域、方向的人进行沟通，或者读他们的论文，从而明确这个领域里面哪些方法是常用的。首先要把这一两个方法你所研究的方向或领域常用的方法先掌握。当然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概念肯定需要清楚，但具体的方法和操作性在刚开始的时候没必要追求面面俱到，因为现在可以用于语言学研究的统计方法太多了，可以列很多很多。而你的专业就决定了你所收回来的数据的结构。不同的数据结构需要用的方法不一样，有些方法特别复杂，可能你的研究不会用上。所以一开始聚焦在你研究方向上常用的方法，把这个方法先掌握。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一个统计方法你从原理到操作，包括操作中的各个步骤，你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我建议你就不要用。初学者他有些时候会觉得某个统计方法比较好，但他可能并没有真的了解这个方法，没有了解这个研究是否真的适合使用这种方法。所以对于方法的选择，你如果自己判断不准，一定要请教一下行业内的资深的那些研究人员，

看看到底什么方法是真正合适的。对于方法的原理和操作，需要很好的掌握，如果你实在是不能理解我个人建议，就用更简单的方法，不要去用没有真正理解的一个统计方法，因为这样有可能最后汇报统计结果，阐释都是有偏差的。没有必要为了量化而去量化，因为要解决你这个研究问题，可能或

许简单的方法也能办到。

Q: 我们知道,您最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您的专著,您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国际发表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A: 其实我属于写的比较慢,谈不上什么心得,我个人的体会是,国际期刊比如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一般需要你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或者方法上有创新,你总得有一个创新的地方,他才会接受,所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好处是,如果他没有直接把你拒掉的话,都是有希望的,因为它会给你非常详细的意见,你就一步一步按照意见修改,如果你哪个意见没有明白,你也可以和他进行讨论,所以即便最后不能发表,通过修改的这个过程,你会得到很多知名专家的意见,帮你完善整个论文,然后你可以改投其他期刊,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专著的出版方面,我的专著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大修,增加一些内容,然后再出版,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专家评审。有很多意见。我的心得就是基本上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就可以。刚毕业的博士生而言,刚开始投稿时就朝着你这个领域,你觉得最好的期刊去投,找最好的出版社去联系,即便不能够发表,你也可以获得很多宝贵的意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有些可能不一定赞同,因为这样可能被拒的几率要大一点吧。

我当时是和我导师商量的,我按照导师的建议来投的。需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了解你所要投的期刊,写作风格、格式都要和期刊要求符合。所以我个人建议,在

写作之前心里先要有一个目标期刊,按照目标期刊的风格和格式规范来写。可以找这个目标期刊的几篇文章来多读读,明确期刊写作的风格,要求。写作完成之后也可以请 native speaker 来看看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

Q: 最后能否请您给《言思录》的读者们几句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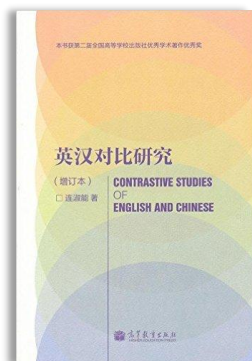
A: 我就想到我导师跟我说过一句话,“Our doubt is our passion, and our passion is our task”.这句话是 Henry James, 他在谈到艺术创作的时候,说了这句话。我导师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句话其实同样适用于科研,就是说你在科研的过程中,要带着怀疑的态度,质疑精神,而这个质疑精神也成为你做研究热情的来源,而带着质疑精神和研究热情去从事科学研究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所做的事。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把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打通了,就是说这句话,既可以用于艺术创作,也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结语:正如张炜炜老师所说,包括认知语言学方向在内的语言学研究目前出现了向实证研究转向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扎实而系统的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对于语言研究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习者在阅读文献之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着手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研究方法技能,从而更好地发现新知。这个过程无疑是艰辛的,可就像

● 访谈实录

张炜炜老师引用 Henry James 所说的：“Our doubt is our passion, and our passion is our task”，质疑精神是研究者学术热情的来源，而学术热情又驱动着研究者在科研之路上不断探索，砥砺前行。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推荐书目选摘』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页数：363页
ISBN：9787040292657

【第 18 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杜磊，叶颖推荐】

《英汉对比研究》(连淑能)

【内容简介】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分上下两篇：“英汉语言文化”与“中西思维方式”。上篇首先论述英汉对比研究的重要性、英汉语言对比研究、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英汉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英汉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而挑选十对带有普遍意义的英汉语言文化专题，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逐题进行对比分析。下篇首先论述思维方式的定义、类型、思维方式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思维方式的四大基本特征，进而挑选十对中西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逐对进行对比分析，并概括这十对特征之间的互相联系。《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摘自 亚马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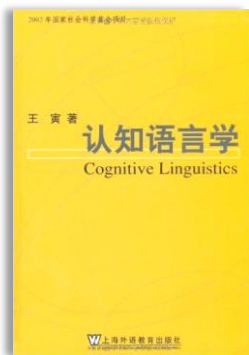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页数：261页
ISBN：7544622363

【第 19 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明建平，叶爱推荐】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金立鑫)

【内容简介】

由金立鑫编著的《外语学术普及系列:什么是语言类型学》以问答的形式，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史，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其他语序学研究的关系等。《外语学术普及系列:什么是语言类型学》既有对语言类型学宏观的规律性、概念性描述，又有语言类型学中微观的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个案研究。全书语言流畅通俗，内容深入浅出，分析精辟入里，是一部了解语言类型学的好的入门“教材”。(摘自 亚马逊)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
页数：681页
ISBN：9787544602051

【第 21 期博士沙龙静湖读书会分享人罗瑞丰推荐】

《认知语言学》(王寅)

【内容简介】

本书将狭义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并以此为主线，将定义中提及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对诸如感知体验、范畴化、认知模型(包括 CM、ICM、ECM、心智空间)、意象图式、隐喻转喻、识解等认知方式，逐一展开论述。(摘自 当当)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最新学术成果选摘



◇ 朱磊. 南昌话元音的声学空间

[J]. 语言研究集刊. 2013(01)

朱磊, 郑新民. 语用学应以宽广的认知、社会和文化视角来考察语言和语言使用——著名语用学家 Jef Verschueren 教授访谈录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0(03)

◇ 郁喆隽. 中国宗教研究的类型学问题——从江南民间宗教出发

[J]. 宗教社会学. 2015(00)

郁喆隽. 马克思的宗教剥夺论与补偿论——宗教社会学的继承和反思

[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12(00)

◇ 孙会军. 韩素音使我与翻译结缘

[J]. 中国翻译. 2015(01)

孙会军, 郑庆珠. 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中敏感因素的跨文化传递与译介原因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06)

孙会军. 《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A]. 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摘要[C]. 2013

上外博士沙龙电子期刊《言思录》(第七期)征稿启事

各位研究生同学：
大家好！

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拓宽学术视野，推动学术思考与创新，上外博士沙龙电子刊物《言思录》(第七期)“主题书评”板块现面向广大研究生同学征稿。本期书目为《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由我校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胜忠推荐书目。征稿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

1. 征稿对象：全国各高校硕博研究生

2. 具体要求：

1) 征稿书目：

书名：《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

作者：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2) 请有意投稿的同学以征稿书目为读本撰写书评，或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感想，针对此书的某些内容和章节，撰写文章。注：征稿不限专业，诚邀各专业的同学撰稿。

3) 投稿截至时间：**2017年1月31日**。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文章长度：不少于 3000 字。

4) 被录用者的稿件将于《言思录》(第六期)刊登，并有专家点评。同时，作为感谢，上外博士沙龙将提供纪念品一份。

5) 投稿同学请在文章最后写明个人信息，方便后期修改、交流等联系沟通，包括：姓名、学校、年级、专业、联系电话、邮箱地址。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
《言思录》编辑部



上外博士沙龙